



传媒、现代性与 工人阶级主体性探究

以《工人日报》(1949~1992)为例

吴畅畅◎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传媒、现代性与 工人阶级主体性探究

以《工人日报》(1949~1992)为例

吴畅畅◎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媒、现代性与工人阶级主体性探究：以《工人日报》(1949~1992)为例 / 吴畅畅著. —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043-6986-4

I. ①传… II. ①吴… III. ①《工人日报》—研究—1949~1992 IV. ①G2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2984 号

传媒、现代性与工人阶级主体性探究
——以《工人日报》(1949~1992)为例
吴畅畅 著

策 划 刘 媛
责任编辑 王晓剑
封面设计 嘉信一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52 (千) 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6986-4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言

本书通过对以《工人日报》为代表的工人媒介进行跨度为近40多年的文本与话语分析，力求梳理工人媒介再现的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历史性过程，以此探查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媒介公共性发展的可能，以及“复线”写作计划在中国情境运用的适用性问题，由此纠正西方学术界对新中国工人阶级研究所含藏的冷战思维与预设的奇观视角。

《报刊与主体性的共识：革命的火炬》描述了十七年时期的工人报刊如何在国家、工会以及工人阶级之间平衡力量，并持续将国家意识形态对工人一体双面任务的召唤持续注入工人主体性的锻造之中。1966至1976年间，中国的大众传媒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新闻产制时期，毛泽东时代的大众传媒一直维持着一种奇妙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代表了共产党政策的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中的空前一致，并由此证实了大众传媒新闻实践的悖论与中国现代性内在的历史矛盾的贴合，并构建了在革命造反之外的，超越后毛时代企图赋予“文革”以“闭合的记忆政治”的代群文化。1980年代以来，新的现代性发展计划与毛泽东时期产生明显的断裂，而个人追求财富的渴望得到来自官方的肯定与鼓励后，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性光荣”逐渐淡去而被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所取代，以《工人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介（而不是民间媒介）从延续性与社会性别两个方面对新闻产制做了巧妙的修正，以维系一个同质性的媒介工人图景。这是《大众传媒的分野——延迟的渴望》中主要探讨的

内容。

虽然 90 年代以后并不是本书分析的重点，却想由此带出前三章分析媒介逻辑的一条线索，即媒介产制、现代性与工人主体性的锻造三者之间的链接，由此能清晰地看到，工人主体性在官方媒介的新闻及其他产品的起落沉浮，而媒介的公共性也在工人主体性的得失之间悄然转换了具体内容。而民间媒介的介入，反而成就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主体——工人阶级在新的现代性项目中的发声权利，以及参与、影响政治生活的可能性。本书志不在铸就一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人阶级的发展史，却想透过大众传媒，探查出曾经一度辉煌的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形成，及其必然性是如何再现于工人报刊为首的官方传媒之中，不论是“革命的火炬”还是“红色运动”，工人阶级的主体性透过媒介“公共性”平台，帮助完成了内在于新兴的民族国家的（重）工业化与扩张的任务，这段历史成为了挥之不去也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的宝贵遗产，后毛时代的国家政权与“下属”工人阶级都从中吸取资源作为各自历史叙事与代群记忆的思想贮存库。当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官方传媒中不再一如既往凸显他们的身影时，民间媒介的“另类”叙事作为“复线历史”的珍贵材料却成就了工人们矢志不渝的历史记忆，以及对国家政权的依旧拥护！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阶级、传媒与现代性的悖论	1
第二章 报刊与主体性的共识：革命的火炬	49
第一节 召唤：翻身的记忆	56
第二节 工人媒介：在国家、工会与工人间起舞？	69
第三节 “共识”制造：技术革新/命	83
第四节 媒介想象中的工人团结	101
第三章 大众传媒的分野：延迟的渴望	123
第一节 官方媒介与现代性的断裂：从记忆到怀旧	127
第二节 社会性别的悖论：浪漫爱与劳动模范	145
第四章 复线历史、媒介的公共性与主体性的消逝	168
参考文献	185

第一章 阶级、传媒与现代性的悖论

本书探讨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80 年代末期间,关于现代性的构成及其项目与传播媒介之间的文化政治,通过显示大众传媒对工人阶级形象的塑造以及话语召唤的变化过程,力图对中国媒介从毛泽东时代至后毛泽东时期的性质变迁作文本与话语分析。

关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传媒的描述,传统的新闻史研究自成一派,对党/国模式主导下媒介形态的强调成为叙述的重心^①;而另外一批学者则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都市报的兴起,采用起源于西欧的“市民社会”理论,对大众传媒所导致的民主性后果表示赞同,其前提是“国家—社会”二分模式下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传媒运作过程中的可能性释放^②。

在官方版本的新闻史研究中,大众传媒的定位一直属于政治主导型,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商业因素开始引入到媒介图景里,但

① 具体可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1999 年人民出版社)。该书主要以通行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作为蓝本,或者说中国政治发展的脉络成为了书写中国新闻史的主要脉络。

② 具体可参见黄瑚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2002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黄瑚试图探索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线索,使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分期能够建立在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所以新闻专业主义(又称为新闻职业化)成为了本书树立中国新闻事业史发展除党报之外的另一条线索。此外,孙玮所著《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2006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书写报纸研究的视角、理论、方法。

“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叙述依旧保证了官方话语对媒介的政治性定义。在整个描述中,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被固定化了,媒介的任务也被固定化了,但是,中国政权自身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①,它与媒介的自主性之间必然会导致各种矛盾、冲突,这恰恰符合了葛兰西^②关于霸权的“动态性”描述。这种缺失在第二代研究者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充,特别是媒介与民主、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等关于媒介自主性议题突破了我国新闻传播领域里单方面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盲点,虽然建诸于之上的“国家—社会”二元模式以及相关概念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存在着化约主义的嫌疑^③,但对社会传播以及媒体与社会互动过程的关注,意味着将传播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中来审视^④。

其实,社会/理论在传播研究中的重要位置,早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就已经注意到,默多克与戈尔德^⑤曾提出过实践中的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核心任务:文化物品的生产、文本以及文化消费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的框架可以成为本书进行媒介分析的重要工具:传播系统分配与整个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分配的“同构性连接”,社会阶级的内部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包括不平等)如何通过媒介进行自我转换,从而让普罗大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各种“阐释框架”。

① 罗丽莎(Lisa Rofel). Rethinking Modernity[J].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92, 7(1): 93—114.

② 具体可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译,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他对于“霸权”的动态性分析成为了上世纪中期英国文化主义流派的重要思想支柱。

③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s Strike in 1957[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4, 137(3): 1—27. 以及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lations[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4, 139(9): 707—713.

④ 赵月枝. 全球视野中传播与权力的运作: 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 [M]. 2006 未发表中文版.

⑤ 格雷厄姆·默多克, 彼得·戈尔德. 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 [A]. 见: 詹姆斯·库兰, 米切尔·古尔维奇(编), 杨击(译). 大众媒介与社会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64—70.

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历史背景的特殊性,考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力量的运动,在历史互动时所带动的社会变迁过程^①,这启示我们在进行话语与文本分析时,有必要将焦点放在建构的过程,而非仅仅关注结构的再生产。以这样的视野来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0年40余年间,中国经历了数次政府领导人的更迭,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动摇,可是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型构(configuration)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别,最直观的表征是前后时期对现代性的迥异追求上,尽管媒介文本上再现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热烈拥抱,可是媒介对现代性的建构,对现代性项目主体之一的工人阶级的建构,却烙上了不同风格的政治印记,而这正是本书所要分析的重点。

本书的分析起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性的发展脉络。对于中国而言,对现代性的追求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建立现代国家的计划,在《退族护史》一书中,杜赞奇^②反对了线性叙事对于治史立说的局限性,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尽管参与了把民族国家建构为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载体,但着眼点却是与启蒙历史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进化论。正是在这一维度上,他对本尼迪克·安德森著作《想像的共同体》^③提出质疑,认为安氏的政治“身份认同”观念化的方式存在根本性问题,现代社会并非唯一能够产生政治自觉的社会形式,无论从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意义来说,将自身想像成“历史”的统一的集体主体的民族身份认同不仅不可能,更遑论只是在现代才能成为可能,中国近代现代性的发展

① 文森特·莫斯科(著),胡正荣(译). 传播的政治经济学[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10.

② 杜赞奇(著),王宪明(译). 退族护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16.

③ 本尼迪克·安德森(著),吴叡人(译). 想像的共同体[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20.

就是个案,因此他主张治修中国史必须参与创造一个特定的中国民族主体,在这个建构过程中,不仅需要反对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方法”也成问题,“复线历史”叙述模式在此基础上得以提出。可见,杜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论的立足点是20世纪初至民国时期的中国现代性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境况并未着墨太多。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使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借鉴西方的行政模式与社会体制的理论,当时的国际因素以及总的意识形态倾向使当时新掌权的中国共产党断然做出“一边倒”并向苏联学习的决定,其最终考虑还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切的使命感^①。尽管作为(政治)现代性独特指标的理性自主与自律,平等与参与,运用到中国情境时,容易产生不同的意义,可是在鲍曼^②的描述下,共产主义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图景,它只是单方面的被纳入到以现代化的名义从事社会与资源动员的任务之中,鲍曼对现代性的论述从《现代性与大屠杀》^③开始,在之后的著作里依次分析了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现代性道路发展的种种情形,他认为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制度是启蒙乌托邦的酸性实验^④(acid test for the enlightenment utopia),通过以国家秩序替代个人自律,它在民间确立了社会理性高于并优于个人理性的信念。而在波兰,它的现代性恰恰不是在布尔什维克与农民之间的张力中形成,“波兰社会主义道路”标榜的就是与前苏联的异质性,相反,政党与工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与松动推动了现代性的发展,遍及波兰 49

① 费正清. 中国的再统一 [A]. 见: 费正清, R·麦克法夸尔(编), 谢亮生等(译).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卷 革命中国的兴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30.

② Bauman, Z. Communism — A Postmortem [A]. In: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24.

③ 齐格蒙·鲍曼(著), 杨渝东等(译). 现代性与大屠杀 [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04: 1—24.

④ “酸性试验”(acid test for the enlightenment utopia, Peter Beilharz, 2002)按照鲍曼的意思,是指苏维埃制度的确立翻转了西方启蒙运动的根本前提:个人理性与自律。但鲍曼的预设前提是,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也是一种现代性模式,这种模式与以西欧为中心的现代性模式在价值与文化模式上产生了根本分野,是对后者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与试验。

个省、长达两个月以争取自由组织工会权为口号的1980年波兰工人阶级罢工斗争可兹为证，因为这次事件被视为植根于公共领域自律性的市民社会的出现，而这一切全部是依靠工人阶级完成的。

鲍曼对共产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的论述可以集中在一点，就是共产主义是现代性的核心叙事之一^①，只是鲍氏理论强调了社会历史即波兰和前苏联背景的关键意义，这挑战普世性的历史叙事与线性预设，取而代之，从事社会制度与变迁的比较性研究。这里，重点不在于中国的现代性是否真的按照西方或者苏维埃模式发展，而是理解在何种条件下，中国的政治精英如何想象现代性并努力打造国家^②，同时“工人群体”^③如何与这种想象交叉并表达出自身的现代性想象。

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是综合了社会主义的普遍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计划的现代化方案。费正清^④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谈到，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过程中，使用延续性之对中断性、内在性之对外在性这样的习惯范畴并无助益，因为这二元范畴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实践中是相互转换的。但是，民国时期，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却感到必须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进行彻底的检讨修

① Peter Beilharz, *Modernity and Communism*; Zygmunt Bauman and the Other Totalitarianism[J]. Thesis Eleven, 2002, 70: 89.

② 罗芙芸（著），向磊（译），*卫生的现代性* [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01。

③ 在这里，笔者并没有冒然使用在葛兰西主义层面上“下属群体”一词，但贺萧在《危险的愉悦》（2003年中译本）一书中认为之所以不用官方话语“被压迫阶级”，而使用“下属群体”来描述草根大众，是因为这一词语包含了社会性别和其他诸多因素，从这一层面而言，笔者赞同在近代中国使用该词作为治史的修辞之一；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毛泽东时期，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不论在官方定义还是生产实践中，都与过去的封建奴役与资本主义剥削有了根本性的割裂，贺氏使用具有次要地位与下等意涵的“下属群体”便稍显不妥；进入后毛时代，工人阶级的命运再次发生逆转，官方叙事与现实境遇产生难以弥补的裂痕，“下属群体”一词已然具备了可兹应用的现实情境（具体可参见注释50）。

④ 费正清，*中国的再统一* [A]。见：费正清，R·麦克拉夸尔（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中国的兴起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3。

正,只有这样,现代性才能使半殖民状况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①。与此相呼应,史书美^②也指出,正是“半殖民主义”这一特定的殖民情势——一种多重外国势力对中国进行多层次占领的政治方式——才使得中国以更强烈的方式,以对现代性的渴望来取代中国文化^③。

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连接与断裂是本书分析社会主义中国现代性的关键,也是前提,远非抛弃现代性,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现代性的下面,即现代马克思的名义下进行的一场斗争^④。毛泽东及其政府抛弃了孙中山“次殖民地”性质的判断,借用列宁的理论发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话语来描述解放前中国社会的状况:国家的政治地位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社会经济结构在形式上仍是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占主导。笔者同意刘康^⑤的主张,将现代性与现代化两者结合起来用,强调两者之间的关联。特别论及到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时,应该重视的是主观和意识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创立一个现代的历史叙事,及其叙事框架中的现代的革命主体的锻造。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性叙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定位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问题为“封建残余”并随之清扫灭绝的召唤型模式:它仿佛是一支革命先锋的火炬,在要求进步的渴望与担心落于世界之后的恐惧的双重面具下,势将欧美资本主义超越到底。

这种召唤之所以行之有效,来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的权力模

① 贺萧(著),韩敏中等(译).危险的愉悦[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8.

② 史书美(著),何恬(译).摩登的诱惑: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写作(1917—1937)[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5.

③ 感谢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2006中译本)导论中对中国现代性的梳理之于我的启发。

④ 罗丽莎(著),黄新(译).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5.

⑤ 刘康.中国现代性的不同选择的再反思[A].见:刘康.文化、传媒与全球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44.

式——对身体的规训与监视。白鲁恂在其著作《中国政治的精神》^①中声称，新中国政治权威的树立，得益于始于满清王朝的积贫积弱、长年内战不止以及多重外国殖民侵略而造成的民间社会对统一与和平的强烈诉求，这也为新中国进行的现代性项目创造了广泛的民众基础，“新”、“旧”社会的话语模式也彻底割裂了新中国现代性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杜赞奇^②所言的历史时间的“断裂”。所谓历史时间的“断裂”，按照杜氏的理解，其实就是前现代与现代性的对立，若放到亚洲国家的话，就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譬如中国历史时间的断裂就出现在20世纪初，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对现代性的种种追寻方案。他将这种断裂读成描述过去与现在的鸿沟的一种方式，而鸿沟出自于确立民族为线性历史的主体。可是，笔者却想将这种断裂延伸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如同他曾援引的班克罗夫特对美国史的研究，所谓时间的断裂造成了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脱离，却成就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恰恰是杜赞奇所忽略的。

可是这种时间的断裂造成的困境是如何被线性时间经验所克服呢？杜赞奇分析指出通过塑造一个统一的形而上的历史主体，从而与民族主义的政治相互牵连，能为进化叙述增添一层稳定感。但面临同样的民族时间的断裂问题时，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却能巧妙地利用这种困顿，从而为历史叙事增加更具现代性色彩的合法性，亦即授权民族的人民必须通过重新塑造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③。以此反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观，它严格依循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线性发展模型，但是这种依循正是建立在打破过去之于现在的束缚、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前借

① 具体可参见白鲁恂的著作《中国政治的精神：一个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权威危机的心理文化研究》（HUP，1968）。在本书中他认为个人对政治权威认知的过程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尤其重要。

② 杜赞奇（著），王宪明（译），《退族护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8。

③ 同上：16—17。

鉴日本与欧洲的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探索的基础之上,旨在创造和维持一个关于国家的新的道德话语^①以及对经历进行的新的权威诠释的能力。紧要之处在于,新中国的出现标志着第三世界里崭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不仅要歌颂中华民族永恒的特性,也要同时努力强调作为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空前性,这样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困顿”却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图景中造就了可兹利用的资本,以此锻造新中国现代性项目自觉的历史主体——工农群众。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传统文化里国家之于民众的遥远距离,社会制度的变革,把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事务重新嵌入民间社会,通过阶级斗争与社会动员的方式^②以及“忆苦思甜”,让城市工人阶级进行自我规训与相互监视,社会地位的提升,加上大众被政治排除在外的惯性一旦被打破,事实证明,这造成了工人阶级之于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政治事件高度的参与感与积极性,如上所述,这种参与感的形成来源于民众对于创造出以民族国家为修辞、以“新”社会为话语的线性历史叙事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信任,同时也让国家权力的实施与运作逐渐在日常生活的管制工程中全面渗透。

据此,杨美惠^③才断言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才能算作中国现代性的转折点,新中国成立之后实施的国家再分配经济(state re-distributive economy)制度,国家掌握了对个体衣食住行绝对的控制权,并且这种控制权延伸至政治领域,即文化与社会政治化。她认为对于现代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是并非通过暴力与压迫的方式,而是通过规定人口的各项需求而实现的权力,同时工人阶级的形成也打破了职业与层级的衡量标准,“劳动”成为了新社会里最根本的公

① 罗丽莎(著),黄新(译).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6.

② 杨美惠(Mayfair Mei-Hui Yang). The Modernity of Power in the Chinese Socialist Order[J].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88, 3(4):415-421.

③ 同上:411-413.

民守则，以及人人必须铭记于心的社会美德^①，只是，杨美惠在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国家被剥夺了作为权力唯一来源与权力终结的特权角色，国家被重新安插进社会里，这只是表面症状，按照官方定义，权力一切属于人民，权力被人民所掌控，强调大众动员与参与，把群众运动对于官僚程序和机构所造成的不稳定效应看成是健康的，至少是可以被接受的^②。可是人民在运用权力的同时，也在不自觉的接受来自国家对个体身体的监视，重点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物资与人力资源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全国性调配，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进入到被国家全面接管的状态，而不是相反。在此，杨氏的叙述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群众运动的神圣化模式让她得出的结论从纯粹强调国家权力一方的极端主义走出来，却从陷入了片面强调个体能动性的一极模式里。但是，颇具启示的是，杨氏提出的新中国权力运行模式的“生命政治”色彩与现代性的关联。在福柯^③的论述下，生命政治的核心是，在西方进入现代性社会以来，政府对公民身体诸如健康、卫生、寿命、种族等种种方面的执著、保护与监视。中国社会主义的权力新形式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生命政治”现象，国家重新定义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的关系，并以毛式的“人民”观念替代了“公民”^④，并将这种

① 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46—348。

② 詹姆斯·R. 汤森（著），顾速等（译），中国政治 [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8。

③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A]. In: Paul Rabinow, Nikolas Rose (ed). The Essential Foucault [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202—207.

④ 根据福柯在 1979 年的讲座《The Birth of Biopolitics》可以见得，“生命政治”是政治在身体上的运作，即生命的政治化。在生命政治里，没有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区分，所以阿伦特在探讨极权主义的起源时，从难民出发，讨论了人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转变。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将人与公民视为一体，因此福柯的“生命政治”其实是国家对公民身体的监查机制，人必须是公民才具备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标志着另外一种“生命政治”的出现，国家重新定义并转化了人与公民的关系，国家对公民的义务转化成国家对“人民”的义务，远非人与公民的统一体，“人民”被赋予了意识形态色彩，其操作原则除了从阶级出生外，关键是拥护党/国意识形态的正确性，符合线形历史叙述的需要，维持社会主义的团结，这才是国家施与“生命政治”的真正对象（具体可参见本章第三部分）。

“国家再分配经济”^① 当做展现现代性的手段，保证与管理人们日常生活、健康、成长以及规范性道德发展的现代性项目。

马克思主义的线形历史观念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精英对新型的民主社会的向往，于是，他们积极地参与到了一个国际性话语的体系之中，并且进行了部分改造，在地化的处理只是为了更加契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能够编写出一部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了把这种话语改造成一种在建立现代国家过程中进行社会动员的学说，需要建构一个特殊的历史主体：由于反帝运动成功的经验，以及由被压迫者的团结性启发而产生的道德正义世界的理想，导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实行的优待少数民族政策^②，或者说，西方社会的种族主义矛盾一开始就被在第三世界独立而光荣的“民族/国家”身份所化解；而阶级斗争需要制造出敌我双方的界限，因此，民族——人民的主体身份的出现，不仅适于文明与生存的主要价值源泉，同时也满足了历史传承或政治上的需要^③。

同时，这种主体性锻造的合法性也有其现实基础，长期革命并最终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成功经验让共产党更加确信了在面临中国的现代性的问题时自己给出的一套方案：以农村包围城市，完成了锻造一个民族国家主体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工农联盟，主体是无产阶级，它成为了第三世界以社会主义方式建立的民族国家的前提^④。主体性的型塑、构成以及内容成为了毛泽东时代最主要的规划，此时，大众传媒日益承担了这项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性任务，并在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性权力模式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传播体系，很好地帮助实现了民族国

① 杨美惠 (Mayfair Mei-Hui Yang). The Modernity of Power in the Chinese Socialist Order[J].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88, 3(4): 412.

② 杜赞奇 (著)，王宪明 (译)。退族护史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2—104。

③ 同上：20。

④ 吕新雨。乡村建设、民族国家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纲要 [M]。2007 未发表中文版。

家对人民群众的“生命政治”功能。首先必须定义彼时大众传媒的范围，在毛泽东时代主要集中在平面媒体，譬如党报与党刊，有革命根据地时期平面媒体创办经验的支持，它们成为了最重要的官方叙事材料之一，对于“文革”期间出现的大字报与样板戏，则是独具传布效应的传播媒介，作为报刊等大众传媒的附属形式，却能经常传达出具有高度机密性质的讯息^①，同时也成了不同政治观点（斗争与冲突）的阵地。当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具有民族国家色彩的叙事与想像性空间，电影成为了持续构建民族国家概念的视觉载体^②。但步入至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人民群众的“生命政治”的关怀开始逐渐褪色，相应的，主体性锻造的内容与形式也发生转变，但属于中国大众传媒的这套独特功能却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中国媒介具体操作的重要规范。这种规范性效应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意转向形成了一对悖论，最直观的表现是民间媒介的出现以及与官方媒介的新闻（或其他产品）产制发生偏移。

二

对于国内媒介的探讨，特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必要区分官方媒介与民间媒介，这种二元划分当然颇值得商榷，但后者的出现至少代表了民间社会相对于国家的逐渐独立，而这正是后革命时代现代性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必须对民间媒介作一定义，在本书里面，民间媒介主要指涉的是相对于官方媒介而言的社区以及独立影像，“独立”在这里并非刻意凸显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或者媒介投资的个体特征，而是就媒介接近权及其范围而言，独立影像传布的受众范围并非大面积，就这点来说，它与官方媒介其实处于力量不均衡的二元结构里^③，前者从

① 白鲁恂 (Lucian W. Pye). Communication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J]. Asian Survey, 1977, 18(3): 222-223.

② Chris Berry. China on Screen: Cinema and Natio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③ 这一点上感谢赵瑜和陈婷与我的讨论并给予的启发。